

翻译学科百年: 演进、反思与趋势

黄忠廉 张 潇 (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)

[摘要] 创建翻译学是中外译学界的百年梦想。1970 年代以降, 翻译学科意识渐浓; 近 40 年来, 尤其是中国的翻译学科梦曾得到周期性热议与推进, 形成了几次热潮, 伴生了一批成果。本文从学科的元思考、架构演进、方法论探索等方面, 对中西既有成果进行梳理与反思, 展望学科前景, 旨在固本拓新, 优化其结构, 革新其创建模式, 以便更科学地建设翻译学科。

[关键词] 学科建设; 翻译学; 演进; 反思; 趋势

[中图分类号] H059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2-9358(2020)06-0001-06

1. 引言

汉语“学科”既指按学问性质所划分的门类, 也指学校教学的科目。本文主涉前者, 顺及后者。学科建设始于呼吁, 坐实于试建, 致力于发展与应用。自 Holmes 倡导译学提出译学框架以来, 西方译学发展历经了不同范式, 中国译学创建在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中推进, 历经了译学创建的可能性、必然性、理论化、学科化等阶段。本文基于既有学科建设实践与研究, 描写国内外翻译学科研究的演进, 进而反思与前瞻, 以推动译学建设的未来发展。

2. 学科创建与译学元思考

学科之成立与创建标志着某一领域的知识之系统集成与深入思考。

2.1 学科创建之或然与必然

无论学科内部发展, 还是学位点外部体制建设, 均表明翻译学创建乃历史之必然。译学草创之初, 中外均曾受到质疑, 如 Holmes 1972 年提出翻译学框架后十余年内无人再提; 1980-90 年代国内曾讨论译学成立之或然与必然, 国外主流亦对 translatology 之名踟蹰。其实全球早已具备创建的沃土, 两千余年丰富的翻译实践已积累了充盈的翻译思想。人类从译, 对其必有思考, 深入、细化、系统化的翻译研究代代相继, 所以“翻译学的建立, 是一个客观的存在, 翻译学之路, 是一条必由之路”(许钧, 2004:

38)。1980 年代以降, 西方译学东渐, 中西会通, 催生了本土现代译学的发展, 且日趋系统化。

2.2 学科地位之稳固

译学确立得益于定名与建制。因为名不正, 则言不顺, 正名可谓学科的根基, 正名之后方可定名, 学科才便于定位。翻译学即研究翻译的科学, 是“翻译科学”的简称。杨自俭(1996: 27) 以为“研究翻译的科学应成为一个较大的学科, 可以叫翻译科学”, 将其定位于独立的跨科的综合性科学, 建议升级“列为文学门类之下的第三大科学”。

学界呼吁是学科所负之责, 最终需经相应机构承认, 才能立名, 以号令学界。1980 年代末以降, 译学界一直力争学科独立, 2004 年首家翻译学学位点由教育部设于上海, 可视为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得到体制认可的标志。为此, 《中国翻译》2004 年第 3 期特刊一组专题文章以致贺。译学确立以来, 其学科内涵得以发掘, 体系逐渐完善, 框架日益充实, 社会贡献独特而巨大。可以说, 中国崛起, 译功居伟; 中国走近世界中央, 翻译功不可没。

2.3 译学元思考

译学创建, 必过名实关。西方纠结于 translatology 和 translation studies, 将后者首字母大写定为“翻译学”, 小写定为“翻译研究”(杨荣广, 2018: 7), 而 1987 年张泽乾(1987: 56) 就直接明确: 翻译学“是探究翻译系统的结构、功能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”。

[基金项目]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汉译组构优化研究”(编号: 15FYY019)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“文化外译优先规划研究”(编号: 20YJA740022) 的成果之一。

[收稿日期] 2020-03-10

[作者简介] 黄忠廉, 博士,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 研究领域: 翻译学、汉译语言; 张潇,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, 研究领域: 翻译理论与实践。

杨自俭(2000:4)指明“翻译研究”(translation studies)是将翻译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学名称的初级形态。进入新世纪,学界已达共识,翻译学堪称一门科学,名实相符,比如2003年贾正传(2003:46)所言,翻译学研究“人类所从事的翻译活动的性质和规律”。

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,有必要反思本身的成就与不足,明确短板,调整目标,这便是元学科反思。元学科反思首先从反思翻译学的本体论、认识论和方法论开始的。元反思涉及若干问题,“包括翻译学的概念和性质、对象和内容、结构和成分、地位和作用、发展模式和历史等”(贾正传,2003:45),可将系统观用于元翻译学,始终将翻译学视为系统,借助系统的概念和性质,整体上把握翻译学的概念和性质。“理论翻译学是翻译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,理论翻译学具有元学科的作用。”“理论翻译学的元学科反思以翻译本体论为基础。”(黄忠廉,方仪力,2017:5-6)译学本体论,涉及翻译本质、翻译学的界定等问题,其中至少需厘清某些概念,如翻译本体与翻译研究本体,前者指语际转换过程的根本要素及其内在关系,后者还涉及语际转换之外的因素。(谢天振,2008:6;高雷,2013:109)不过,内外相比,内部因素更为基础或重要。对此,傅敬民和袁丽梅(2017:80)也有同感:译学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关注翻译宏观理论的构建,而应该以翻译实践和教学为本体。

3. 学科建设演进

学科创建一般可分肇始期、试创期、发展期与建成期。对中国译学发展,杨自俭(2005:2-3)分为开创前、开创、建设与发展、独立发展四个阶段;王克非(2019:819)则分为萌芽期、成长期、发展期。综观中外,译学创建在破茧之后,初期受质疑热议,继而短时静寂,因现实发展达成共识,开始致力于发展。不过,演进分阶是相对的,可随时长微调。

3.1 中国译学创建演进概貌

肇始期 20世纪中期之前为中国译学的前学科时期。学科意识上,与西方相比,“我国的译学意识在时间上显然更为早一些”(傅敬民,袁丽梅,2017:82)。如蒋翼振(1927)《翻译学通论》首用“翻译学”,行学科之名,无学科之实,未建学科体系。后续有董秋斯1951年主张创建翻译学,有所推进,具有战略高度,唤起了翻译学人的学科意识。时过30年,学科对外借鉴始于1980年代后期,译学界热

议翻译学,1987年起张泽乾、谭载喜等在《中国翻译》《外国语》《外语研究》连刊数文,再次呼吁创建翻译学,初见框架,在学界激起反响,为翻译学正名奠定了思想基础,此后学界更加“言顺”了。黄龙(1988)虽说悄然著有 *Translatology*,同样也未建学科框架。

试创期 20世纪后20年是试建期,亦是学科形成期,重在为学科明身份、争地位、辩重轻、定性质、说缘由、搭结构、觅理据,具体涉及学科的内容、目的、范围、任务、方法等。1996年劳陇(1996:38)在《中国翻译》上呼吁学界丢掉幻想,联系实际,旨在揭破“翻译(科)学的迷梦”,又引起国内争议;1996年刘宓庆(1996:2)指出中国翻译学研究已陷入“静寂期”。1998年黄振定写有《翻译学:艺术与科学论的统一》,2000年千禧年谭载喜与彭卓吾各自推出名为“翻译学”的专著,标志着翻译学学科理论体系以专著形式尝试建立,获得了学科身份的具体论证。与此同时,郑海凌(2000)《文学翻译学》创建了翻译学的分支学科。

发展期 2000年代至今为发展期,重在内涵建设,完善学科体系及理论体系。译学建设起步走向成熟,韩子满(2019:22-23)对本期分得更细:1995-2003年为学科意识觉醒期,2003-2009年为研究深入拓展期,2009年至今为理论与对象创新期。2005年杨自俭(2005:2)认为中国译学建设已进入建设发展期,需集中精力完善与落实学科建设规划。但是,时过15年,按其所定的五大标准(对象和领域清晰,学科性质明确,学科理论体系成形,学科关系清楚,具有学科方法论),目前译学建设仍在发展期内,离建成期为时尚早。

国内近20年来翻译学科意识与时俱增,通论者减少,分论者增多,冠名“(翻)译X学”和“X(翻)译学”的书文纷纷问世,文章以辜正坤(2002) *Metatranslatology*(《玄翻译学》)为代表,专著则有2004年黄忠廉和李亚舒的《科学翻译学》、2007年王秉钦的《文化翻译学》、2009年许钧等的《翻译学概论》、2013年胡庚申的《生态翻译学》、2013年黄忠廉等的《应用翻译学》、2017年陈东成的《大易翻译学》、2018年吴志杰的《和合翻译学》等,见证了“我国应用翻译研究进行分支学科构建、从理论意识萌芽到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”(蓝红军,2019:84)。

3.2 国外译学创建演进概貌

1950年代以前是西方译学的前学科时期,此前并未提出译学建设问题,仅1940年代,Nida撰文系

统阐述翻译过程时明确提出了翻译是科学的主张。(谭载喜,1995:12)而1950-80年代是其学科形成时期,学者们萌生学科意识,意欲促进译学走向独立。Nida被西方尊为现代译学的鼻祖,这得益于其1964年出版的*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*一书。后有学者指出“译学作为独立学科1980年代业已建立”(Bassnett & Lefevere,1990:vi)。

建构译学的系统化尝试虽说始于1972年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Holmes宣读的*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*正式公开却是收入1988年由其主编的论文集的同名论文(1988:67-80),至此,这一“翻译学创建宣言”(Gentzler,1993:92)才得以面世,才可视为译学创建之先声。Holmes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(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)和应用翻译研究。西方其他学者也陆续提出译学构想,如Bassnett(1980:1)将翻译学定义为涉及面广且错综复杂的独立学科,包括翻译史、翻译与译语文化、翻译与语言学、翻译与诗学。Wilss(1982:58)认为翻译学属于边缘学科,包括普通翻译学、描写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。随着译学发展,前述三位学者慢慢淡出了学界,取而代之以他人。自Holmes文章正式刊出十年后,翻译学成为了“独立学科”(Hermans,1999:30)。Toury(1995)发展了“描写翻译学”,而Munday于2001、2008、2012和2016年四次推出专著,三次修正Holmes译学体系,不断推进的是应用翻译学领域。译学研究也曾中、西、苏三足鼎立、各自繁荣,苏联时期的翻译研究在语言学范式之深入上甚至超过了西方,但1989年解体之后,范式未再更新,译学研究逐渐落后于西方。

3.3 学科框架演进

学科框架首先呈现为学科分支体系,其次是理论体系,当然前者可包含后者。

3.3.1 学科理论体系试建

译学理论体系构建,国内最早可追至董秋斯(1951:3-6),他从传统译论析出翻译批评,又纳入翻译史,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译学理论框架,译学框架渐具雏形。刘宓庆1990年推出《现代翻译理论》,草拟了译学框架内部系统的理论框架,包括翻译理论、翻译方法论、翻译程序论、翻译风格论和翻译教学法五个方面,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大事,标志着中国译学理论研究步入新的台阶,得到了学界的认可。20世纪末,译学创建之必要性在国内曾引热议,有过“中国特色派”与“普遍理论派”之争。但鉴于发

展程度之不同,域外学术传统难免成为本土译学发展的桎梏。杨自俭(2000:6)曾发问:中西译学理论体系的外延与内涵有何异同;中国译学理论体系有何独特的内部结构;中国译学理论体系是按传统自建,还是参照西方改造。此外,杨自俭还对我国译学建构作出了组织贡献,2009年专门召开了青岛“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”,与会专家多数是专题专论,详见任东升(2010)。

译学体系化构建要落地,离不开译论建设。1996年杨自俭(1996:26)表示今后的研究应重视理论体系的严密化和范畴概念的等级系统化;2000年他又点明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缺点:传统译论重原则与范畴的整体把握,轻结构与层次剖析;重翻译实践体验,轻要素分化与专门研究;不热心系统理论建设,不善于将经验升华为理论;理论原则与所建范畴多义且流变。傅敬民和袁丽梅(2017:80)同样认为,译学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关注宏观译论构建,而应本于翻译实践与教学,切实加强中微观研究,以构建宏、中、微三环良性互动的整体性译学体系。

我国学者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,越发认识到译学创建不能成为西方的附庸,应建立基于中国实践、反哺本土、带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译学理论体系,他们越发明白,出路在于学习西方,基于汉外互译实践,结合中国传统译论,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学。2019年方梦之(2019:3)仍然指出,中国译学道路不是简单地“寻古”或“去西方化”,要基于汉外互译事实的搜集、整理和阐发,重在译学理论上有所建树,从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、能与西方译学对话的理论。

3.3.2 学科结构系统化

学科结构有内外之分,内部侧重学科框架的提出、完善与确立,是学科系统化发展的内核;外部侧重学科的定位、体制、制度等的确立与改进,是确保学科持续稳步发展的支撑。在此重点涉及内部,即学科框架的系统化。

自学科成立提上日程起,中外均有学者尝试构建学科框架,为学科结构系统化做出了贡献。中西译学话语从碰撞到交融,历经了西学的东渐。杨荣广(2018:8)认为中国译学虽早有萌芽,真正发展实则受益于西方,“真正对翻译学科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是Holmes 1972年关于翻译学性质、研究对象与任务的讨论”。不过,横看东西方,Holmes框架图影响虽说至远至深,勾勒了基于描述、理论、应用三分的学科框架,却远非完整的学科体系。在张山峰(1998:43)看来,该图并无玄妙之处,因为每门学

科几乎都作如此三分。更有中国学者提出己见,如张泽乾(1987: 57-58)较早借系统论考察译学系统,提出译学系统观:翻译系统有内部结构和层次,向外与各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形成了复杂的外部系统;翻译的内外系统合为译学系统框架。同样有别于西方,刘宓庆(1990)提出的翻译学学科架构分内外子系统,内部系统为翻译学的本体,外部系统为相关学科领域。1989年杨自俭(1996: 27)也作过简要建构,包括翻译学、翻译艺术学和翻译工程学三层次。

傅敬民(2016: 102)认为,健全学科体系先要理顺学科内部各种逻辑关系。根据学科内部结构层次,其“内部结构中间部分是理论核心,外围是应用部分”;理论核心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,对应用部分起导向作用;具有潜力向纵深发展,是学科发展的直接动力;应用部分使学科向横向发展。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界限清楚、自成体系。(杨自俭 2000: 5)

对学科结构体系化的尝试,观点纷呈、视角众多、成果斐然,以至于20世纪末国内争相创建译学,立名以立学。但据贾正传(2003: 46-47)从内部结构和系统整体视角所做的评价,从结构上看,翻译学体系由分支学科按一定层次与分支关系构成;以此观之,目前译学体系尚不完善,某些层次和分支学科尚未成熟,仍处于前科学状态;但译学体系已现雏形,多学科研究之风已是蔚然。在批判吸收西方译学的同时,杨荣广(2018: 9)发现译学框架的拓展主要归因于应用翻译学领域,朱健平(2020: 19)则认为可以构建基于构成要素的互联互动型译学框架。

4. 学科发展反思与趋势

自蒋振翼1920年代首提“翻译学”以降,迄今已近百年。传统译论发新芽,西方译论现生机,中西碰撞交融,借译学发展回顾之机,正可反思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。

4.1 固本拓新与结构优化

学科发展有本可依是其核心问题。首先需要明确译学研究的本体、主体分别是什么。可以反思我国译学研究:何处亟需增强?20年前,主流仍只关心以理论指导实践,对理论的评价甚至理解也只以实用为准;作为基础的描述性译学研究并未真正展开。(张南峰,1998: 42)翻译学科虽然是经验学科,译学发展源于经验、基于经验,对经验本身的科学描述必不可少,但是描述性译学也并非止步于描述,译

学研究对翻译重在解释而非单纯描述。源于经验论的实证类研究有助于学科建设,实证法主要采用归纳思维,而译学许多理论与思想无法直接由实证产生,实证向思想的跃升,还需深思熟虑的逻辑化结果来催化。翻译经验如血肉,而理论似骨架,译论缺失,译学则无法立足。

对翻译经验的客观描述仅是研究或者描述性研究的起点,若将客观描述全当作学术研究,结果不免碎片化、平面化、浅层化。补救的措施便是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,即发掘现有学科理论难以或不能解答的问题,能对翻译形成独到且系统的见解。如此产生的翻译观只有与时俱进,才不会对现存的翻译事实有所疏漏,才能做到全面而且客观。比如,“等值”“等效”观曾在外国占主导,“忠实”观在中国占支配地位,而不“等”不“忠”的翻译被认为无效,不等不忠的翻译观虽存久远,却为学界后知后觉。类似的译学根本性问题,均需理论回答,更待学科诠释。

译学建设一面需要固本,一面需要拓新、继续优化结构。翻译学既然已是二级学科,首先就要优化其内部系统,使其成为科学且便于操作的分类体系。(罗列 穆雷,2010: 15)如前所述,Holmes框架提出经其他学者完善后,Munday又三次修订,所拓展部分均在应用翻译研究。回望霍氏框架,相比其他两个分支,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进展较慢,理论翻译学或能成为未来着重发展的方向。

4.2 完善学科理论体系

迄今为止论及学科体系,多关注学科分类系统,而对理论系统下力不够。译学艰难创立后,后续建设的确面临着更多挑战,如体制、标准、队伍、环境、体系、学术成果转化等。(蓝红军,2015: 34-36;陶友兰,2017: 84)但这仍是外部体制的挑战,学科能否立稳,根本取决于理论体系是否完善完整,这才是内部存在的挑战。正如韩子满(2019: 25)对笔译研究不足的批评:国内对翻译研究认识还不够准;忽视新翻译现象而只迷于理论创新的学者不少;过于关注文学翻译;对传统译论总结、梳理乃至阐发不够。其实,这一现象同样见于国外。但笔者觉得根本性不足仍在于译学理论研究不够,传统译论的现代阐发不够深入全面,当代译论的构建不够扎实。杨自俭(2005: 2)2005年搭建了译学本体系统建设的五大支柱:传统译学继承性研究、外国译学借鉴性研究、翻译现实问题探索性研究、相关学科吸融性研究、方法论多层次研究,这五大领域仍需加大系统研究,产出标志性成果。

当前不仅要像 Holmes 那样从纯学术角度构建学科的分类,更应真正深入展开纯理论研究。杨自俭(2005:3)曾指出学科建设规划重点首先是学科理论系统的研究,需20年。迄今为止,他所期待的理论研究难如人意。译学建设本身具有体系性,内部更需译论支撑,目前突破性的学科理论还不多,沉潜式研究者尚不多见,“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,也缺少自成体系、独成一家的理论探索,更少见到能对其他学科产生较大影响的基础性的理论专著”(许钧,2004:38)。任一学科可由一论独支,或双论同铸,或多论共筑,那么当务之急是加大原创理论研究,译学建设可以借鉴,但更须自建,直接从其他学科借鉴概念、借体系者不是译学建设的主航道,要将思想转为理论,再由理论升为学科。现有的理论可以进一步系统化,创建分支学科,比如将变译理论进一步提升为变译学,或许是方梦之和王志娟(2020)的期待。又如,我国口译研究是一项朝阳事业,经过初步、较快、蓬勃三段式发展之后,任文等(2019:34)依然认为口译原创成果较少,主动创新意识尚需增强,发现新问题、新视角的学术敏感性有待提高。笔者认为口译研究首先在“口”,通观当下口译研究的项目、著述和会议,离“口”渐行渐远;若能回归初心,不出数年,“口译学”计日可期。

4.3 讲究译学研究方法

学科方法论对学科建设的关键性仅次于核心问题,是学科得以建立继而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;译学从发源到发展到成熟,大致遵循单学科、跨学科、交叉学科、超学科创建的机制。但国内外均缺乏对译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,已有人做出各种尝试,如将其分为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,每个范畴又分具体方法(冯全功,2013:92);或分为翻译实践方法论与翻译认识方法论(蓝红军,2019:13)。1980年代之前译学创建多限于单学科,至多基于语文学或语言学。1980年代以降,专业研究队伍开始形成。因译学具有跨学科性,他学科的参与必不可少,译学或许难以绝对专业化,但研究队伍应以本科为主,他科为辅(张南峰,1998:41)。跨学科研究是译学建设相对重要的方法,“分哲学思维、语言符号和社会文化三个系统”,分别为译学建设提供“理论依据、论证手段和参照范畴”(杨自俭,1996:26)。其中,跨学科移植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。翻译涉及双语转换,最近的学科是语言学,便出现了以翻译研究为受体、以相关语言学观点为供体的跨科移植。移植的结果不能是“混合物”,而应是“化合物”

(李运兴,1999:59)。跨学科相对于翻译学可以跨入,也可跨出,如果双向跨越,则上升为交叉学科研究了。

基于跨学科而继续发展所至的层次更高的研究方法便是超学科,超学科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处理现象的复杂性,以解决问题为导向,属于应用性研究;而翻译是一项复杂实践行为,翻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经验性(谢柯,邱进,2018:13-14)。廖七一(2012)也持同一看法:因问题意识驱动的多学科研究将集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,成为未来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
4.4 探索学科创建范式研究

由前可知,单学科、跨学科、交叉学科、超学科的研究机制可归并为两类译学创建范式,即本体译学创建范式与关系译学创建范式。本体译学创建,即仅就翻译本身展开学科建设,主要探究译学本体的性质,是译学创建之本,属于基础性建设,理当成为译学研究的起点。译学界若不关注本体,更难以祈盼他科学者深究译学本体。当下更需深读精析译本的功夫,本体学科功夫越不牢,译学体系就越不稳。与之相应的是关系译学创建,即对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展开的学科建设,属于应用型建设。此类研究选题往往偏大,对译学论述易浅尝辄止,但因可广泛借鉴其他学科新鲜思想,趋之者也不在少数。若是借各种理论硬套,弃译而阔论,译学研究过度扩疆而鞭长莫及,会导致自身去中心化,失去学科的根基。

译学初建成型约莫20年之际再提回归本体,只因为译学本体研究依然薄弱,问题多从译中找,再去探求外因,才是译学研究所特有的问题观。未来译学创建可走本体类译学创建和关系类译学创建平行的路径,二者互补,但本体类是根基和核心,深入但量小;关系类是应用与外围,面广且量大。

5. 结语

学科建设永远在路上,面对译学创建,不轻言问题的解决,而首先是问题的认识,继而解决,最终解释。以问题意识驱动学科创建,采用多学科联动,超学科思维。面对中西译论,强调特性而不否定共性,对国外译学既不简单比附,也不视而不见,而是会通中西;承认中外译学创建可以相互交融,于中外差异、矛盾、对立中互动,倡导尚杂、兼两、主和的译学观,立于本体学科建设的同时加强关系学科研究,或

是译学创建的未来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Bassnett, S. *Translation Studies* [M]. London & New York: Methuen & Co, 1980.
- [2] Bassnett, S. & Lefevere, A. (eds.). *Translation, History and Culture* [M]. London: Pinter, 1990.
- [3] Gentzler, E. *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* [M]. London: Routledge, 1993.
- [4] Hermans, T. *Translation in Systems: 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Explained* [M]. Manchester: St. Jerome Publishing, 1999.
- [5] Holmes, J. S.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[A]. In J. S. Holmes. *Translated!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* [C]. Amsterdam: Rodopi, 1988: 67-80.
- [6] Wilss, W. *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: Problems and Methods* [M]. Tübingen: Gunter Narr Verlag, 1982.
- [7] 董秋斯.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[J]. 翻译通报, 1951(4): 3-6.
- [8] 方梦之. 建设中国译学话语: 认知与方法[J]. 上海翻译, 2019(4): 3-7, 94.
- [9] 方梦之, 王志娟. 变译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[J]. 外语教学, 2020(1): 82-86.
- [10] 冯全功. 试论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[J]. 外语学刊, 2013(5): 92-98.
- [11] 傅敬民. 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科边际[J]. 中国外语, 2016(5): 14-19.
- [12] 傅敬民, 袁丽梅. 新时期我国译学体系化的思考[J]. 外语学刊, 2017(3): 80-84.
- [13] 高雷. 翻译本体与翻译学体系[J]. 山东外语教学, 2013(5): 109-112.
- [14] 韩子满.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笔译研究: 学科的诞生、成长与成熟[J]. 外语教育研究, 2019(1): 20-26, 87.
- [15] 黄忠廉, 方仪力. 基于翻译本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[J]. 中国翻译, 2017(4): 5-10, 128.
- [16] 贾正传. 翻译学系统观——用系统观考察元翻译学的尝试[J]. 外语与外语教学, 2003(6): 45-49.
- [17] 劳陇.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[J]. 中国翻译, 1996(2): 39-42.
- [18] 蓝红军. 翻译教学——新时期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关键[J]. 中国大学教学, 2015(6): 32-37.
- [19] 蓝红军. 译学方法论研究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9.
- [20] 李运兴.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[J]. 外国语(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), 1999(1): 56-62.
- [21] 廖七一. 由“器”入“道”: 翻译研究的学科疆界与方向[N]. 中国社会科学报, 2012-01-30 (B06).
- [22] 刘宓庆. 现代翻译理论[M].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1990.
- [23] 刘宓庆. 翻译理论研究展望[J]. 中国翻译, 1996(6): 2-7.
- [24] 罗列, 穆雷. 翻译学的学科身份: 现状与建设[J]. 上海翻译, 2010(4): 11-15.
- [25] 任东升主编. 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构建 2009 年青岛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论文集[C]. 上海: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10.
- [26] 任文, 郭聪, 黄娟.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译研究 40 年考察[J].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, 2019(1): 27-37, 88.
- [27] 谭载喜. 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[J]. 外国语(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), 1995(3): 12-16.
- [28] 陶友兰. 我国翻译教材建设与翻译学学科发展[J]. 上海翻译, 2017(6): 83-88, 94.
- [29] 王克非. 新中国翻译学科发展历程[J]. 外语教学与研究, 2019(6): 819-824, 959.
- [30] 谢柯, 邱进. 翻译的超学科研究: 认知与步骤[J]. 上海翻译, 2018(2): 12-17.
- [31] 谢天振.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[J]. 中国翻译, 2008(5): 6-10, 95.
- [32] 许钧. 翻译学科建设任重道远[J]. 中国翻译, 2004(3): 38.
- [33] 杨荣广. 定名与求实: 翻译学的学科演进再反思[J]. 上海翻译, 2018(2): 6-11, 94.
- [34] 杨自俭. 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[J]. 现代外语, 1996(3): 26-30, 73.
- [35] 杨自俭. 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[J]. 中国翻译, 2000(5): 4-7.
- [36] 杨自俭. 如何推动翻译学的建设与发展[J]. 上海翻译, 2005(3): 2-3.
- [37] 张南峰. 从梦想到现实——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[J]. 外国语(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), 1998(3): 41-47.
- [38] 张泽乾. 现代系统科学与翻译学[J]. 外语研究, 1987(3): 56-61, 50.
- [39] 朱健平. 构建以构成要素为基底的翻译研究学科框[J]. 中国翻译, 2020(1): 19-30, 188.

One – Hundred – Year Development of Translatology: Progress , Reflection and Trend

[Abstract]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e of translatology has long been an aspi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translation scholars alike. Since 1970s , especially in the past 40 years , the efforts of building the transl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have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 periodically , with some fruitful achievements.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translatolog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, from the aspects of meta-discipline , discipline structure , and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, in order to provide in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. The whole aim is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basic research fields , to optimize the discipline framework , and to expand a creative and scientific mode of discipline building.

[Key words] discipline construction; translatology; development; reflection; trend

On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of Applied Translation ——Enlightenment from Fang Mengzhi’s Works

[Abstract]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,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do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 , which calls for practical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work. We need to answer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, including how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, where to get its theoretical discourses , how to enrich its theoretical content , and what to set up as its thinking mode. Fang Mengzhi , a brilliant leading scholar and a founder of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, gives us a lot of enlightenment with his works. This paper explores Fang Mengzhi’s thoughts on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,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some guiding ideas for future endeavors in this field.

[Key words] Fang Mengzhi’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Studies; Applied Translation Theory; methodology; practice-oriented

On Translator’s Rhetorical Awareness in C – E News Transediting

[Abstract] C-E news transediting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voices and telling China’s stories. In this sense , translators are both message conveyer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ors in global communication. To better achieve transediting’s desirable results , transeditors need to have 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rhetorical tradition and persuasion mechanism , and appropriately employ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news transediting that can suitably meet the target readers’ reading expectations. In this way , the voices and stories of China might be put across with success.

[Key words] news transediting; international discourse; persuasion mechanism; rhetorical awareness

Thoughts on a Viable DTI Program in China

[Abstract]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TI programs in China’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,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pecial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since 2006.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“One Belt , One Road” initiative and the promotion of “Chinese culture” going global have put more requiremen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-level translation talents , and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MTI graduate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high-level talents in the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.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up a DTI program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before putting forward some ideas on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DTI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objectives , admission requirements , curriculum planning , and teaching models.

[Key words]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,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,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